

原 墨

郭万金 艾冬景

摘要:墨子影响极大,史料极少,有限史料中孕含着无限的文化信息。史家的态度,诸子的褒贬,使得枯竭史料中的墨子形象渐为丰满。墨之源流,近本于工,远溯于巫。古代国家大事,惟祀与戎,儒以祀为职,墨以戎为业,并为显学。墨家“以戎为业”,正是以“工”为其显著标识的,其言行思想表现出典型的技术思维与军事色彩。墨子是由“技”而“道”的集大成者,是官方认可的工师,亦是墨家内部尊崇的“巨子”。

关键词:墨子;儒墨;兵戎;工师

“四海逐利”、“天下皆杨”每每是墨学发端的契机。远溯千载,战国纷纭,孟子倡言排墨的背景即是“杨朱之言盈天下”;近百年,国危时乱,梁任公为墨子张目,开篇便称:“今举中国皆杨也!”儒学独尊,牢笼百代,墨家以“救世”姿态奔命于世,独树一帜,卓然分庭抗礼于名利之世,诚有其不废之道。“墨子极富于信仰的宗教精神,又具有极理智的科学态度,此在世界思想史上是一个最奇特的人,不独在中国为仅见而已。”^①然而,如此卓绝的思想家,留于正史的资料,竟一如其为人之“枯槁”。

一、《史记》的态度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末尾寥寥二十四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是墨子在正史中的全部记载。诚如梁启超所言:“此史料可谓枯竭极矣。”^②太史公如此惜墨如金,在墨学沉寂的漫长年代,并不会有太多异议,待到墨学大兴的时期,便会惹出不少为墨子打抱不平的人物。清儒孙诒让称,《史记》摭采极博,“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尚不能质定其时代,遑论行事?然则非徒世代绵邈,旧闻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时具存,史公实未尝详事校核,亦其疏也”^③。后来的方授楚也认为,“一名史家为圣哲如墨子者记述生平,仅此二十四字,草草缴卷,如无其他原因,则亦史迁之疏矣”^④。易白沙亦称,“记载如此简略,此史公之疏也”^⑤。伍非百亦以为“史公去古未远,值墨学衰微之际,对此异派大师,不肯略加考究”^⑥。陈柱对于《太史公书》不为墨子立传,虽颇有微词,却有心开脱,称:“学术上如此重要之一人,而所述乃仅如此而已。故近世学者,深为失望。或讥史公之疏略无识。或以为《史记》之脱简。余以为后说是也。此二十四字,接上文云云,实未免太过唐突。无论如何之古文法,决不如是。”^⑦并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等文法

作者简介:郭万金,山西大学国学院教授;艾冬景,山西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太原 030006)。

- ① 熊十力:《十力语要·谈墨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8页。
- ③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80页。
- ④ 方授楚:《墨学源流》,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1页。
- ⑤ 易白沙:《述墨》,《青年杂志》第1卷第5册(正月号)。
- ⑥ 伍非百:《墨子大义述》,南京:国民印务局,1933年,第5页。
- ⑦ 陈柱:《墨学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为例,认为《史记》系“脱简无疑”。但也有研究者认为“盖”字“或是‘若’字之误”^①。蒋伯潜则“疑此二十四字,乃后来读《史记》者在简末附记而羸入正文者”^②。

其实,《史记》中“孟子传”仅 144 字,实际的传记内容只有 60 余字,不过是增加了几句对孟子不能为世所用的分析。“荀子传”要丰富些,有 193 字,但如剔去插叙议论之言,所余亦不过百字左右。此外,像“淳于髡传”有 244 字,“驹衍传”是最长的,有 516 字。可见,传记字数的多寡与传主的重要程度并没有必然的比例关系。司马迁作此传的旨趣在《太史公自序》中写得十分明确:“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对于“好利之弊”的批评是贯穿全篇的主旨,着力表彰的正是儒、墨的精神。《孟子荀卿列传》以驹(邹)人孟轲发端,紧随其后的是驹子之属:驹(邹)忌、驹(邹)衍,以及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驹(邹)奭等,均在此列。这些人都曾在稷下讲学,有着“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的共同标识,并博得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的尊宠。再次是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的荀卿,也颇受重视,曾三为祭酒,却因谗言而不得长久。公孙龙、剧子、李悝、尸子、长卢、吁子等因“世多有其书”被一笔带过。最后提到是墨翟。驹(邹)衍是“干世主”的成功典范,淳于髡以承意观色为务,亦得厚遇,然“终身不仕”。孟子不合于世,荀子三为祭酒而受谗,文直事核的叙述中以“以学干世”为主导性关注,不枝不蔓,施以浓墨的人物中深蕴春秋笔法,全传的褒贬意味在“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的慨叹中尽显无遗。在“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的时代风潮之下,孟荀之儒术自然不合于世了,略早些的墨子其实同样也是“不合于世”序列上的人物。司马迁明显存为生前寂寥者立传表彰之用心。

最后出场的墨翟被冠以“宋之大夫”的头衔,这一点在《墨子》中却未能得到证明。《墨子》中可以作为墨子与宋关系密切的有力证据有两条:一是《鲁问》篇中有“子墨子出曹公子而于宋”之语,俞樾认为此句当作“子墨子仕曹公子于宋”解;再有就是最著名的“止楚攻宋”,墨子不惜兼行十日十夜救助宋国。然而,这两条证据均未被司马迁认可,而未采纳入传。《史记》除本传外,涉及墨子及墨家的记载有 13 处,绝大多数都以“儒墨”并举的模式出现。半数来自他人言论的转引,如《始皇本纪》、《陈涉世家》引贾谊《过秦论》,《礼书》引《荀子·礼论》,《鲁仲连列传》引鲁仲连所遗燕将书,《邹阳列传》引邹阳狱中所上书,《李斯列传》引赵高语,《主父偃列传》引徐乐上书,《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余者则系史迁之语,进入史传叙述的有两则:《庄子传》称庄子“剽剥儒、墨”,《荀子传》称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此外皆是太史公的议论之语,分见《平津侯主父列传》、《游侠列传》、《太史公自序》等。司马迁尊儒宗道,对于墨家亦颇为敬重,其父《论六家要旨》墨家存 129 字,儒家仅存 63 字,并充分认可了墨家“虽百家弗能废”的地位。反复称引的儒墨对举虽非史迁自语,却也透露出其对墨子的“称贤”态度。《孟荀列传》中的“猎儒墨之遗文”不仅明白无疑地表明了太史公的承继弘扬之志,更透露出司马迁的谨严审慎的记述态度。

对于战国诸子的言论,司马迁虽不排斥,却采用谨慎。《史记》以“通博”称著,班固称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言其“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③。《汉书》所谓“据”、“采”、“述”之间的细微差别,恰是司马迁审慎态度的彰显。“据,仗持也”(《说文解字》),所针对的史料则是《左传》、《国语》这样可以倚信的信史。“采,辨别也”(《说文解字》),所针对的则是《世本》、《战国策》这样真伪杂糅的史料。“述,循也”(《说文解字》),所针对的则是去己不远的近世史料。《汉志》不立史部,《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虽均为六艺略之春秋属,然作为史料的可信程度却大不相同。《世本》系“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④,然而,司马迁所

① 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3页。

② 蒋伯潜:《诸子通考》,台北:正中书局,1948年,第191页。

③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37页。

④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4页。

持的态度却是“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①。《世本》不过为所择取的“百家”之一,可以依据者依然是《春秋》、《国语》。至于《战国策》,更是信伪参杂,后世更以子书目之。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的一番话很可说明他的态度:“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②《秦记》、《春秋》虽可为据,然史料湮灭,“战国之权变”虽不足全信,却亦不可偏废,“颇采”遂成为司马迁所抱持的态度。所谓“战国之权变”不仅包括《战国策》,而且也涉及各部子书,孟荀老庄当在其列,《墨子》自然也在其中。诸子之书“并非一人自著,大抵皆其后学之所增中依托也”^③,更为重要的是,其“称述故事,或以证成其学说,或仅论定其是非”^④。子书中作为论据的故事材料显然并不以真实可信的事实陈述为目的,问难比物,寓言传闻,杂糅并出,本末不详,时序错乱,真伪难明。于此,司马迁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这些思想史的材料并不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描述,遂于“颇采”的基本判断下,以“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⑤作为一般手法,采摘熔铸,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对于诸子言论中的各种行事,审慎入传,如其在为苏秦立传时就曾指出:“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⑥“止楚攻宋”是墨子最为光彩的事迹,除《墨子·公输》外,《战国策》、《吕氏春秋》、《尸子》、《淮南子》等均有记载。对于如此重要的事件,《墨子》不云何时,对答精彩,却于情理难合。起首的“不可谓”排比,已然不类墨子风格;如此辉煌的义举,颇合于儒家之道,但孟、荀均未提起;一番并不十分切中要害的机械对答便将一次伐国的重要军事行动取消,不免过于草率。这一故事很有可能是墨家的夸饰之辞^⑦,此类现象在子书中不胜枚举,所以,司马迁称其“善守御”而不录其事,亦存疑也。墨子之言论行事,散见于《墨子》诸篇,这些最直接材料的多半被子书如《战国策》等用来“证成学说”或“论定是非”,是思想史的资料,也是社会史的材料,却难以“整齐”为可信的传记史料,生平有阙,纪年不清,不得不以“或曰”收尾。

二十四字的记载固然“枯槁”,但孟荀之传多以其入仕游历而论,亦无太多细节,墨子传中的“宋之大夫”或可与之相当,即或此篇脱简缺文,想来文字也不会太多。西汉时,墨学式微,史料湮灭、匮乏,司马迁很是下了一番“猎遗文”的工夫,但文献真伪杂糅,或有抵牾,详事校核,却无法“整齐”。梳理出清晰完备的生平谱系,慎而立传,仅得寥寥,实非其疏,恰是司马迁对于墨子的特殊敬意。

二、先秦史料中的墨子角色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叙诸子十余人,笔墨错落,但分量都不多,原因也简单:“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⑧司马迁的“不论”用意颇深,因记载之主观目的、缺乏客观佐证等缘故,诸子的论说虽未能成为推演生平、纪事入传的十足证据,却也不可一笔抹煞。诸子之学,重其义而轻其事,口耳相授,谨严不足,然其书既存,自是不争的先秦史料,书中所言,虽非史家的信实之论,却是当时自抒己见的一家之言,是最具价值的思想史料。孙诒让于《墨子》中钩考生平,成绩卓著,虽不得不接受“其

①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②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686页。

③ 罗焯:《诸子学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④ 罗焯:《诸子学述》,第96页。

⑤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319—3320页。

⑥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2277页。

⑦ 刘汝霖先生言:“伐国大事,事前岂无完满计划?岂有为一梯而兴师动众因人有备而中止之理。是未免近于儿戏!且玩墨子说楚王之语,非能使王必听者。”“此盖墨家弟子夸张墨子之热诚之技巧而传出之故事。因公输盘为当时一巧匠,故折辱公输盘之事因之生出。后人视为信史,且考其年代,过矣。”见刘汝霖:《周秦诸子考》,北平:文化学社,1929年,第179—180页。

⑧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9页。

可信乎”^①的追问,然而,于墨子(家)而论,这些年代更为接近的思想史料,无论托辞寄意的故事,抑或往复诘难的论辩,都是墨子(家)信仰习俗、社会思潮、常识观念等最为清晰逼真的呈现。其中不仅有学派本身的自我标榜,更有来自他人的讥刺批评,正史中的“枯槁”形象亦在毁誉宠辱中生意顿起,日渐饱满。

《墨子》中的墨子“生于鲁而仕宋,其生平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②。曾有止楚攻宋、止楚攻郑、止齐攻鲁的非攻义举,亦有讲学游说、献书论辩的知识行为。《墨子》中涉及的权贵人物不多,约有鲁君、齐大王、鲁阳文君、楚献惠王等。鲁君的所指模糊自不必说,齐大王的名称也聚讼颇多^③。只出现过一次的“楚献惠王”也是一笔糊涂账,《贵义篇》载:“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④史无楚献惠王之号,孙诒让据余知古《渚宫旧事》称此处脱佚太多,当为“献书惠王”之误。穆贺则于史无考。鲁阳文君是《墨子》中颇为重要的游说对象,出现多次,却同样语焉不详。《国语》中有“(楚)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的记载,注曰:“文子,平王之孙,司马子期子鲁阳公也。”^⑤《淮南子·览冥训》中“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搗之,日为之反三舍”^⑥,颇具神话色彩的记载使得这位鲁阳公很有些“战神”的味道。墨子与鲁阳文君的讨论基本集中于“非攻”的主题上,“善战”的鲁阳文公与“非攻”的墨子间的对话应该有着特殊的寓意。齐国的项子牛曾三次伐鲁,是墨子极力劝止的一位重臣,正史不载;《淮南子·人间训》中有一位齐臣牛子,曾经用计使伐齐的三国退兵,论者多谓此“牛子”即项子牛,如是,项子牛则也是位能征善战的勇将了。汉代子书中的神话叙述、论辩材料当然不能坐实这段故事,却可体现出墨子选择游说对象的指向性,“非攻”不仅为国君而设,更以“好战”、“善战”者为目标,强烈的对比自然使得墨子的“非攻”形象倍加凸显。

最为饱满的形象当然来自于“止楚攻宋”精彩叙述。《墨子·公输》有着六百余字的详细记录,绝大篇幅集中于墨子与公输班的对话,最为生动的便是“行十日十夜”的急切情态。《战国策》的叙述仅有二百五十余字,却特别写出了“百舍重茧”^⑦的细节。《尸子·止楚师》与此大略相同,再到后来的《吕氏春秋》,则增加为“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⑧的形象描述。这一描述被后来的《淮南子》袭用,还增加了“墨子闻而悼之”的心理描写。然而,最为重要的叙事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却有些缺失、混乱:时间不详;出发地点或鲁,或齐;首先游说的对象或为公输般,或为楚王。分量最足的论辩对话是子书的显著标识,却难以成为严格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由连夜赶路而延伸出来的足部特写,除却踵事增华的文学意义之外,更使墨子的“非攻”形象饱满完备,其后所隐藏的则是社会对于墨子义举的普遍认同。“重茧”的形象在先秦史料中并非仅见,如《墨子》中的禽滑厘,《庄子》中的曾子、土成绮,《韩非子》中的文公随从,《荀子》中“养亲而无孝名”者,以及《吕氏春秋》、《文子》、《列子》中的“禹”。他们或“胼胝”,或“重趼”,大多含有执著行道的勤劳精神,其后能成为人物形象之典范者,则只有“墨子”、“大禹”二人。而稍微晚出的“裂裳裹足”更成为墨子的独特标志,连同“闻而悼之”的心理状态一并写出了墨子的急公好义,“非攻”的急切言行中饱含着“兼爱”的心境,“贵义”的

① 吕思勉称:“诸子中之记事,十之七八为寓言,即或实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据;彼其意,固亦当作寓言用也。据此以考事实,苟非十分谨慎,必将治丝益棼。今人考诸子年代事迹者,多即以诸子所记之事为据。既据此假定诸子年代事迹,乃更持以判别诸子书之信否焉,其可信乎?”并力主治先秦之学者,可分家而不可分人。见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21—22页。

②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629页。

③ 论者多谓齐大王为齐太公田和,但与墨子的时代颇有抵触,参见孙诒让、吴毓江、张纯一诸先生所论。

④ 王焕镳:《墨子集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44—1046页。

⑤ 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27—528页。

⑥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3页。

⑦ 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46页。

⑧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94页。

追求中更有“节用”的务实,如此的墨子已然成为墨家思想的集中代言者。杂家博取众长,不主一家,如此的墨子形象则是意气最少的一般描述。

《吕氏春秋》涉及墨家的记述有22则。其中,专论墨子的有4则,除“止楚攻宋”外,又有“游越”、“叹染丝”、“哭歧道”之事,用意唯在议论。此外,论及墨者的有6则。其余12则中,墨子皆以思想者的形象出现,且每每与孔子共同出现,屡有“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①之论,虽未明言“显学”,但墨子之声望地位亦可见一斑。且《吕氏春秋》在议论之始常以墨子之言论为导引,亦可证明墨子之学在当时的影响力。《晏子春秋》中墨子凡两出,皆以权威口吻对晏子表达认可,称其“知道”^②,立足点仍在“非攻”、“节用”两端。

《韩非子》中涉及墨家的记述约有7处,2处为墨子作“木鸢”,其余5处则围绕“显学”而展开议论。尽管有“李、惠、宋、墨皆画策”^③的批评,亦有“杨朱、墨翟”并为“天下之所察”的认可,尽管儒、墨之学在其“参验”的尺度下“非愚则诬”,但儒、墨两家始终是不容置疑的“世之显学”^④,弟子众多,声望显赫。与之相似,墨家在整个《庄子》中未曾单独出现,而总是或与儒或与杨同时接受庄子的质疑、批评。尽管未曾明确给予“显学”的定位,但频繁的“儒墨”并称,已足以说明二者于晚周学术中的独特地位。

《荀子》中涉及墨家的篇目较多,有《修身》、《非十二子》、《儒效》、《富国》、《王霸》、《天论》、《礼论》、《乐论》、《解蔽》、《成相》等,然态度已大不相同。荀子“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⑤,指摘诸子,昌言排击。与韩非、庄子不同,非乐薄礼的墨家成为荀子重点批判的对象。格外严厉的批评态度固然来自于针锋相对的立场分歧,却也透露出荀子对于墨家的特殊关注。反复深入的批驳指摘恰好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荀子的重视态度,弟子韩非对于墨家的“显学”定位或即以此为本。还应注意的,荀子在批判“俗儒”之流“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时,特别指出“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⑥。此言虽为抨击“俗儒”而作,逆向而思,俗儒的“无以异于墨子”自然意味着墨子与儒家的相似。儒墨的相似有目共睹,却“明不能别”,于隆礼明分的荀子而言,当然要奋起排击,明辨其非。由此可知,荀子的昌言诋墨不仅是由于主张上的分歧,更有辨异层面的特殊指向。对于墨家的影响,荀子并未有明确的认可,唯《成相篇》中有“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的论说。然而,特殊的抨击态度已然显现出了墨学在当时的特殊地位,更暗示出儒、墨间的特殊关系。

《孟子》中关于墨家的资料只有4条,均是批判的态度。与荀子不同,孟子的论述方式是不得已的“好辩”,畅快淋漓,气势如虹,却没有细腻的阐释、理性的分析,实际的推理极为简单,如“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⑦、“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⑧。寥寥数言,分析并不深入,但态度之激烈,却溢于言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⑨孟子素以“距杨墨,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下》)为己任,其于墨家的痛切批评一如荀子,就此而言,亦有与荀子相类之处。《孟子》一书,于当时学派多有批评,然推其所严,则唯杨、墨两家,其中,尤以墨家为最。除墨者夷之外,如许

①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第665页

②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0-181、307页。

③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62页。

④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456页。

⑤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61页。

⑥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139页。

⑦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6页。

⑧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915-916页。

⑨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456-457页

行、宋轲等均为墨家主张之追随者^①，无不受到孟子的驳斥，而如子莫、告子、淳于髡之流亦同样受到孟子的批评。在孟子眼中，这些学者恰如荀子所批判的“俗儒”，亦是其“正人心，息邪说，距诋行，放淫辞”的对象。至于与墨家并称的杨朱，钱穆先生认为：“孟子辟墨，故其后遂有儒墨之争，为先秦学术界一大事。至于杨与墨争，儒与杨争，其事皆难可考见。则以杨本不成学派，谓杨墨者，特孟子一时之私言。”^②杨氏为己，投合世俗，却难以立说，记载寥寥，远不足与墨家相颉颃。“大抵墨之徒尚功利而骛外，故孟子矫之以内心之本源；杨之徒恣情欲而私己，故孟子正之以外部之规范。为杨墨之说者，亦各有其一偏之理由，与其一偏之精神，足以震荡世俗而汲引人心，故孟子遂比之于洪水猛兽也。”^③然而，诸如宋轲、许行、陈仲之类的墨家“不徒其树义甚高，其制行亦甚卓；虽或流于偏激，要为豪杰之士；似非淳于髡、告子之徒所可及。故即观于《孟子》之书，亦知墨家兼爱，实为儒学劲敌”^④。所谓“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⑤，除去思想史意义上的学术思辨外，还须注意的是，墨、杨、儒的关系转化中隐含着逆向发展的潜在趋势：“逃儒必归于墨”——墨子的学儒而废本身即是最好的例证。孟子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抨击墨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即此而论，孟、荀虽有不同，对于墨家的态度却十分相似，对立主张下的严厉批评，恰恰体现出近缘关系下的辨异取向。

诸子言说中不乏关注史实、年代、地位的诸多纠纷，然而，以思想文化的视角切入，直接以言说论辩的叙述态度、内在观念、一般思想作为关注对象，则可以避免一些论点的纠缠，在思想文化的历史脉络中勾勒出略微清晰的墨子形象。先秦史料中的墨子作为“兼爱”、“非攻”、“薄礼”等主张的代言者，算不得血肉饱满的历史人物。起初的墨子仅仅是思想的提出者，且与儒家有着特殊的近缘关系。随着自身的发展以及儒家的激烈批判，墨家的地位得以提升，与儒家一道被视为显学，墨子及其后学的言行日渐成为诸子立说时的例证论据，无论态度上肯定还是否定，无论形象上是丰满还是枯槁，墨子已然成为思想史上无法避绕的伟大人物。

三、儒与墨

对于墨家的思想意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述论颇详。对于墨子的历史地位，司马迁所掌握的信史遗文确实有限，难以成文，特意在《孟子荀卿列传》之后的补缀正是其史家手段的体现。孟子、荀子都是指斥墨子最为激烈的人物，又都是儒家的嫡系，对于墨子的态度多有同源辨异的意味。《吕氏春秋》称：“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⑥鲁惠公在位46年，始于公元前768年，终于前723年。周桓王在位23年，始于前719，终于公元前697年。鲁惠公去世时，桓王尚未即位，其误可知。所谓请礼之事于正史无载，惟真伪颇具争议的《今本竹书纪年》称，（平王）四十二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王使史角如鲁谕止之”^⑦。史料的真伪姑且不论，短短文字中的两处“止之”已有歧义。《吕氏春秋》的“惠公止之”可以是停止请礼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使史角“止于”鲁国，让史角在鲁国居住。《竹书纪年》中的“谕止之”倒是态度明了，直接禁止。再者便是孟苏、夔靖叔、宰让、史角几位人物于史无考。年代抵牾，记述生歧，人物不详，《吕览》记载的可信度自然不高，但在其特别的时序安排中，却隐然将孔子、墨子并为同代之人。

秦火之下，儒学式微，汉之一统，初盛黄老，后尊儒术。虽宗尚道家，但在《淮南子》时代，儒术已

① 参见方授楚：《墨学源流》，第143页；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23—824页。

② 钱穆：《四书释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24页。

③ 钱穆：《四书释义》，第234页。

④ 钱穆：《四书释义》，第234页。

⑤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997页。

⑥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第52—53页。

⑦ 沈约注：《竹书纪年》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然独尊,遂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①之论。再后些的司马迁则以两个“或曰”,谨慎用笔,结束全文。将墨子与孔子置于同时代,显然别有深意。二十四字的墨家史录中有近一半的篇幅用来考量孔、墨的时代,其意义显然不仅在于孔子、墨翟的年寿比较,背后更深蕴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深意。墨子“并孔子时”的说法在后世并未得到太多的支持,刘向称墨子“在七十子之后”,《汉书·艺文志》言墨子“在孔子后”^②。《后汉书·张衡列传》注引《衡集》云:“班与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③儒学一统,“辟墨”主潮下的一般认知大抵沿袭孟、荀的批判思路,墨子“在孔子后”更成为不需辩驳的命题。清代考据勃兴,墨子模糊的生卒年代议题颇受诸家青睐。学者多以《墨子》本书与正史互证推校,汪中认同《汉志》之说,称其说为是,孙诒让也肯定“墨子之后孔子盖信”^④。虽在具体年代上有分歧,但墨子在孔子之后仍是基本一致的判断。

墨子后于孔子之论并未得到十足的史料证明,中间夹杂着不少儒学宗主下的习惯情绪。清儒汪中认为墨子“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此说大约是后世对墨子“并孔子时”最为认可的一种解释,虽认同寥寥,且自身也底气不足。汪中的另一番话却很值得注意,其称:“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老子之绌儒学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⑤这种放弃了儒学宗主立场的逆向思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洞察历史的思想穿透力。对于孔、墨时代的考量,深受思想史上的正统别流尊卑意识渗透,蕴含着层累的历史惯性之影响。史料有缺,孔墨时代的先后无可质定,如汪中这样尽力以平等的眼光使有限推断更接近真相,或是一种可取的思路。《论语》不及墨子,《墨子》颇诟儒者,墨家又备受孟、荀指斥,但司马迁《史记》却将其附于《孟子荀卿列传》之末,更以孔子为参照物讨论其时代,两个“或曰”明显透露出儒墨近缘的意识。“不期修古”的韩非对于“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⑥的主张并不认同,这位反传统的批判者将儒墨并称为显学,视为崇尚先王之道的代表,则是从否定者的角度认同了儒墨的近缘关系。

孟荀的辟墨不免带有正本清源的意气情绪,辨异的关注远远胜过认同的理解。儒墨主张虽有分歧,然相同之处亦为数不少。以孟子传人自居的韩愈便称:“儒讥墨以尚同、兼爱、尚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尚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称,不尚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⑦孔墨相为用的论调颇受宋儒攻击。王安石曰“孔墨必相用,自古宁有此”^⑧,其对头程颐也认为此说“言不严谨”、“甚不可也”^⑨。稍晚些的黄震更旗帜鲜明地指出:“墨之尚同,谓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与孔门所谓如其不善而莫违之戒正相反。……墨子之言兼爱,谓法其父母与法其君皆为法不仁,惟当法天,与孔门所谓孝弟为仁之本者正相背。”故而,“孔子不必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⑩。道统立场下的辟墨指斥不免有些卫道的情绪,执其一端,未暇全面深入论析。明代史家焦竑的态度稍微宽容些,称:“墨氏见天下无非为我者,故不自爱而兼爱也,此与圣人之道兼济何

①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第709页。

②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8页。

③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13页。

④ 孙诒让撰,孙诒让点校:《墨子间诂》,第692—693页。

⑤ 汪中:《述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⑥ 王先慎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韩非子集解》,第456页。

⑦ 韩愈著,刘珍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26—127页。

⑧ 王安石著,李壁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⑨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1页。

⑩ 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异?故贾谊、韩愈往往以孔墨并名。”^①朴学影响下的清儒对于墨家的态度日渐平和,校注疏证,渐不乏人。降及清末,大变局之下的儒学颇受冲击,独尊之势开始松动,诸子之学渐兴,身当其时的俞樾即认为墨子“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之于古,郑重其意,反复其言,以冀世主之一听。虽若有稍诡于正者,而实千古之有心人也”^②。与此同时,俞樾重新肯定了韩愈的论题,称“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并主张“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悦足以安内而攘外乎”^③。特定情势下的“孟主墨辅”显然有着安邦救亡的淑世思考,然而,在走出道统论影响之后的重新认识中,仍可清晰地发现儒墨的思想近缘——墨子与最为排斥他的孟子被一道用作安内攘外的学术资源,且更有一层延续孔子志业的寓意。

近百年间,儒学失尊,诸子平视,关于儒墨异同的讨论亦更为深入细致。其书既存,其事有载,角度不同,立场有异,自然见仁见智。陈柱先生称:“孔墨同言孝,同言爱,同言贤,而趋向各各不同,盖出发点殊也。”^④认为儒墨之异在于所本不同,儒本于父母,墨本于天。张纯一先生则云:“大道无形,本同也。形而为有,则异名。儒墨二家,水火久矣,实无足异。盖体道以致用者殊耳。”^⑤这显然是认为儒墨本同而未异。关于儒墨异同分析最为细致的当为王桐龄先生,他在《儒墨之异同》中罗列儒墨学说28条,其中同者9条,异者19条;罗列儒墨理想20条,其中同者12条,异者8条;罗列儒墨教祖事迹19条,同者10条,异者9条。他特别指出最耐人吟味的三点:一、孔墨学说之根据多相似,而研究所得之结果多不同;二、孔墨之师承颇相似,而相续者多不同;三、孔墨少年时代之经历多相似,而中年以后嗜好多不同^⑥。立学之本的相似显示出儒、墨共同的知识来源,而师承所祖的相似更透露出儒墨之间特殊的近缘关系。萧公权先生即言:“孔墨不同道,世所习知。然此不免皮相之谈。吾人考其行迹,则二者实有相似之处。述古学以自辟宗风,立治道以拯时弊。游行诸国,终无所试。乃广授门徒,冀其能行道而传学。凡此皆孔墨之所同也。……吾人以为就大体言之,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学乃平民化之孔学。二者之言行,尽有程度上之差异,而其根本精神则每可相通。”^⑦熊十力更认为墨子平生愿力所在即其政治社会理想,“根本原则即‘兼相爱’‘交相利’六字尽之。墨子生竞争之世,悼人相食之祸,而谋全人类之安宁,固承孔子《春秋》太平、《礼运》大同之旨而发挥之。谓墨子于儒学为异端,则非知墨者也”^⑧。

“墨子盖深受儒家思想之影响,而卒与之反。其于老氏或亦不无关,如非乐、节葬等主张,与反朴守俭意思皆相通。”^⑨西方也有学者认为墨家的“许多学说同儒家太接近,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⑩。

儒墨之兴,正值“道术将为天下裂”之际,溯其所本,固在古之道术,道术之传,则在官守。“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⑪章学诚的古学探源,推阐刘《略》班《志》之意,以官学为学宗,肯定诸子同源,章太炎先生等皆表认同。胡适先生著《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力诋《汉志》之诬,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与王官无涉。两说抵牾,持论略平

① 焦竑:《澹园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13页。

② 俞樾:《俞序》,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1页。

③ 俞樾:《俞序》,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2页。

④ 陈柱:《墨学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15页。

⑤ 张纯一:《墨子集解》,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第581页。

⑥ 王桐龄:《儒墨之异同》,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222页。

⑦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9—120页。

⑧ 熊十力:《十力语要·谈墨子》,第87页。

⑨ 熊十力:《十力语要·谈墨子》,第88页。

⑩ [英]莱芒·道逊:《中华帝国的文明》,金星男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

⑪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1页。

者,如吕思勉先生曰:“诸家之学,《汉志》谓皆出王官;《淮南·要略》则以为起于救时之弊,盖一言其因,一言其缘也。”^①又如张舜徽先生称:“如谓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犹可也;必谓诸子之学一一出于王官,则不可也。”^②参酌诸贤之论,不难发现,诸子之分歧,在官学既衰,诸子渐兴之更迭演变,在王官与诸子的比拟对应,在儒学与诸子的是否平等,但对古学之源,却颇为认同《易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基本判断。儒墨称先王,同是尧、舜、禹、汤;道前贤,同为稷、契、皋陶;引经传,不外《诗》、《书》、《春秋》;究其学之所出,则同祖述于古之巫者。

作为最早的知识阶层,古之巫者集文化、技能于一身,成为最古老的专家^③。“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微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④智、圣、明、聪兼具的巫覡与《庄子·天下》篇所描述的“古之人”大抵相类。作为古之道术的担当者,“古之人”可谓全知全能,“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⑤。不难看出,兼备诸般本领、沟通天地的“古之人”正是巫覡一脉。古巫禀赋异常,身系多职,声望至高,成为古代社会文化的核心,天下学术皆自其出。其后,随着经验积累,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加快,职事日繁,分工成为必须,古巫承担的所有职能逐渐离散,由更为庞大的知识阶层来分担,正即《庄子·天下》篇所云:“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⑥庄子时代,巫者尚存,且不乏神奇,如郑国的神巫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⑦。但较之“古之人”的齐备全能,已然不及。百家之学在“道术将裂”的天下大势下完成了“哲学的突破”^⑧,形成了特色各异的文化传统,追溯其本,仍在古之巫覡。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巫术永远没有‘起源’,永远不是发明的,编造的,一切巫术简单地说都是‘存在’的,古已有之的存在。”^⑨无法证实的巫术成为文化技能的古老源头,古已有之的古巫则在社会分工中分解为最初的知识者,“祝、宗、卜、史等百官皆是巫之变体,皆出自巫”^⑩。诸子之学,本诸百官,所谓“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⑪,尽管后世儒家有着相当理性化的阐释,但依然可以发现巫术分化的古史痕迹。也许是巫术时代的法术失效,抑或是理性时代的道德失范,“古巫”气息浓重的“天子”,无法沟通天地,难以维系其职守,道术旁落,分散诸家,则有百家之兴,儒墨争锋。

关于儒家之来源,说者甚众,且不乏名家。章太炎先生认为是“求雨的巫覡”,胡适先生认为是“治丧相礼”的殷族教士,钱穆先生认为是通习六艺之术士,冯友兰先生认为儒是散在民间,教书相礼的学问专家。此外又有乐师、礼官、祭师、保氏诸说。关于“儒”(需)之语源的考证,分歧颇多,关于“儒”之职守的具体规限,未有定说,然而,若以粗线条的通约思路来看,有两点大体可信:一、“儒”起源于“巫”;二、“礼”是“儒”最核心的关注。源自古巫,毋庸赘言,孔子亦自言“与史巫同途而殊归”^⑫。在古巫的诸多职责技能中,“儒”于“礼”尤为重视,墨子、庄子对儒家的抨击皆发端于“礼”,而“儒”之重冠服、明典仪,所体现的是对“礼”的直接参与,至于修教化、习六艺则是对于“礼”的间接传播。《论语·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儒家的核心理念、基本精神、一般准则等大抵沿着“克己复礼”的求仁

①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16页。

② 张舜徽:《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100-101页。

③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巫术极古以来便在专家的手里,人类第一个专业乃是巫术的专业。”弗雷泽认为:“巫师或巫医似乎是社会演进过程中最古老人为的或专门职业的阶级”。

④ 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12-513页。

⑤ 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7页。

⑥ 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第1067页。

⑦ 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第72页。

⑧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24页。

⑨ [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57页。

⑩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社,1954年,第118页。

⑪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七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9页。

⑫ 廖名春释文:《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路向展开,视、听、言、动一准于“礼”。《说文》有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大致勾勒出“礼”的原始内涵。《礼记·祭统》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重笔点染出“礼”的核心指向。刘师培曰:“古代礼制悉该于祭礼之中,舍祭礼而外,固无所谓礼制也。”^①这里的古代正是《庄子·天下》篇“古之人”的时代,钱穆亦言:“古人学问,可以一字尽之,曰惟‘礼’而已。”^②全知全能的古巫以一套完整的行为沟通天地人神,其中涉及一系列仪式、规则、文辞、场地、设施、用具等,以及就不同对象、时令的综合考虑,更包含渗透其中的观念、知识、思想等。随着古巫的分化,神、人关注的此消彼长,包罗万象的事神之祀凝结为治人之礼。“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殒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③几乎涵盖儒家一切志业的“礼”正是其于古巫处所接受、传承、发扬、阐释的祭祀传统,“儒”之于“礼”正如“巫”之于“祀”,有着毋庸置疑的绝对意义,而“巫一祀”与“儒一礼”的对应模式,或是对儒家源流的贴切阐释。

“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④“祀”当一国之重,以之为业的“儒”发扬蹈厉,加之孔圣教化广大,遂成一代显学。然而,学术之显赫,并不是哪位圣贤明王可以独力造就的,必有学术自身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更有社会对此相关论题的密切关注,诸般具备,方可实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⑤“儒”因“祀”而为“世”所重,先秦时代,墨家能与之争锋,并为显学,所据为何?宗师墨翟的刻志厉行仅为内力,必有强大外力之推动,方可成就。于古人而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⑥。祭祀之外,关系重大者,唯有兵戎,所谓“兵者,国之大事也”^⑦。作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行为,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战争是古代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周礼》所涉及的国之“大事”、“大故”多系战事,“《易经》中战争的文字之多,实在任何的事项之上”^⑧。由此而论,与“祀”并驾齐驱的“戎”足以形成与“儒”相颉颃的另一门显学。儒家之外,“墨”为显学,其在“戎”乎?

四、以戎为业

“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⑨如果从“兽处群居,以力相争”^⑩的蒙昧时代算起,如果将近乎本能的争斗看作“兵”之初始,和“没有起源”的巫术一样,战争同样是古已有之的社会存在。“中土兵学,肇自炎黄。太公继之,日益昌明,东周之季,孙子吴子,崛起吴楚。权谋技巧,空前绝后,著书立说,体大思精。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⑪于追溯始祖、托名前贤的撰述心理中,不难看出兵学的源远流长。兵者,虽被视为“不祥之器”,但即便是圣人,也不得不用。“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⑫以道而论,诸子百家,莫不言兵,孔子言足兵,孟子论人和^⑬,荀子有《议兵》,《吕览》有《荡兵》,纵横多权变,法家重耕战。迥异

① 刘师培:《古政原始论》(《刘申叔遗书》(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78页。

② 钱穆:《国学概论》,第25页。

③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85页。

④ 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154页。

⑤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456页。

⑥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第861页。

⑦ 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页。

⑧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1页。

⑨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7页。

⑩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68页。

⑪ 陆达节:《中国兵学现存书目(附历代兵书概论)》,广州:珠海大学,1944年,“序”第1页。

⑫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26—227页。

⑬ 李颀《二曲集·四书反身录》:“‘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此二语,说尽保障之要,致胜之机,此兵法之本也。古今许多兵书,得此可以总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15页)

立场下的战争论说,自有百家争鸣的精彩纷呈,亦不乏鞭辟入里的深刻,然而,作为思想者的社会观察毕竟不同于有着实战经验的反思总结,一般意义上的兵家称许依然特指孙武、吴起等人。值得注意的是,孙、吴等人虽被尊为“兵家鼻祖”,如韩非即言“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①,但与儒家并为“显学”的却是墨家。按照“祀”、“戎”并为国家之重的思路来推理,墨之重视军事应与儒之重视祭祀相类,大不同于诸子的泛泛之论,详考墨家之立言、行事,可为印证之处,俯拾皆是。

以墨子其人而论,最为确凿的二十四字史料中赫然有着“善守御”的字样,且是首要的形容之辞。与攻伐相对的“守御”无疑是最为基本的军事活动。太史公对此特别标明,无疑是墨子“重戎”最为有力的证据之一。如前所论,在先秦史料中,墨子最为光彩的活动便是止楚攻宋、止楚攻郑、止齐攻鲁等非攻义举。墨子一次次出现于战争之中,以防御之术成为战争的主角,尽管没有史证的凿实,但墨子对于军事的关注的传说是远远胜过其他诸子的,乃至被视为守御制胜的典范。

以墨家言论而言,《墨子》一书,涉及古之战事者,数量颇多,对上古战争的记载尤为丰富、详细。如《明鬼》篇所载:“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遂下众,人之螭遂,王乎禽推哆、大戏。”^②特别的列阵状写、战事描绘正表现出墨家对于兵戎的特别关注。再如《非攻》篇关于“汤奉桀众以克有(夏)”^③的征程记述,其可信性得到了后世考古成果的印证^④,说明其于战事的记载有着特殊的严谨态度。当然,最具说服力的,还是《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蚁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多达11篇的军备专论,另有关于守城之法的9篇佚文,按《汉书》所载,《墨子》71篇,共计20篇的兵守专论,所占篇幅已极为可观。如果将《非攻》篇这样的兵道专论以及散布于各篇中战事论述也计算在内的话,《墨子》之言兵,当居诸子之首,远远胜过不足六千字的《孙子兵法》。此外,关于《墨子》军事思想的研究,是当前墨子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论者甚众,成果亦丰,绝非其他诸子(兵家除外)可以比拟。

以墨家组织而论,墨家“非仅一学术团体,似革命机关,亦似后世秘密会党,盖组织甚密而纪律甚严也”^⑤。此说最为有力的证据导自《淮南子·泰族训》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的描述,尽管《淮南子》本意在“化之所致”的阐释,然“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的形容已足以体现出墨家团体组织之严密、纪律之严格。作为补充的个案史料则来自于《吕氏春秋》对于墨家“钜子”腹黄享、孟胜、田襄子等言行的详尽记载,其中有依法杀子的“忍所私以行大义”,更有“弟子死之者百八十”的酷烈。所谓“墨子之门多勇士”^⑥,墨家于“勇”极为重视,《修身》篇起首便是“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⑦。对于“勇”的强调,本自对“战”的关注。当为留意的还有《墨子·鲁问》篇的一则记载:“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其子战而死,其父让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学其子,今学成矣,战而死,而子愠,是犹欲桀,余雠,则愠也,岂不费哉?’”^⑧不难看出,弟子于墨子处所修习的正是“战”,“战而死”被看作“学成”的自然结果,不当有所怨悔。不近人情的对答与墨子的“兼爱”主张似乎颇为抵牾,然而,在墨子的“守围城之法”中,“罚严足畏”乃是不可或缺的必备因素,如“皆斩”、“车裂”、“断无赦”的字眼比比皆是,对于“以书射寇”的通敌者,更是不惜株连其父母、妻子,“身泉城上”。如此的严刑酷法,并非法家的惨礲少恩,而是军事家令行禁止的果断坚忍。不难看出,墨家的组织有着深刻的军事背景,“墨子的精神显示了某种军人的严格和简朴倾向,在追求智识的条理上非常严谨。他的门

① 王先慎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6页。

②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243页。

③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149页。

④ 参见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68页。

⑤ 方授楚:《墨学源流》,第225页。

⑥ 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3页。

⑦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7页。

⑧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472页。

徒组成的社团也组织严密,依稀有军队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门徒虽然恪守他对侵伐战争的批评,但他们确实成了战国时公认的防御守备的行家,在战争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①。无论是不辞劳苦的非攻止战,抑或是生死以之的号令服从,就墨家团体的组织性质而言,其所表现出的军事特征已足以说明墨家的以“戎”为业。冯友兰先生即言,墨子讲军旅之事,瞧不起俎豆之事之繁文缛节,“盖此为其团体衣食之资,与儒之礼乐同”^②。

墨家著述,归于子部,自然无疑。《汉书·艺文志》师袭刘歆《七略》,分六略三十八种,诸子略下有“墨六家,八十六篇”,分别为《尹佚》、《田俟子》、《我子》、《随巢子》、《胡非子》、《墨子》^③。然而,在兵书略中,特别标出“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④。在兵权谋家下,班固注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⑤略考所言诸书,多有用兵权谋之论,然数量有限,以全书之比重而言,所占甚微,故而省去。《墨子》则不同,除去近三分之一的兵备专论外,涉及军旅之事者,数量亦众,列为兵家,本无可,然前已收入墨家,故曰“省重”,细微差别中,正可看出墨家特殊的兵戎色彩。

《论语·卫灵公》有云:“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孔子对于兵戎的刻意回避与墨家的关注重视恰好相反,俎豆为“祀”之象征,军旅则是“戎”之根本,儒家的重“祀”为墨家的重“戎”留足了空间,墨家能与儒家并为显学,正在于其对“国之大事”另一端“戎”的身体力行与深入思辨。《汉志》兵家分权谋、形式、阴阳、技巧四类,《墨子》所属的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古今异宜,故不传于后”^⑥。而兵权谋,“专论用兵之理,几无今古之异”^⑦,流衍最广。关于用兵之理,诸子各有见解,或深或浅,或专或泛,《汉志》于此类之下,省略最多,孙、吴以思论之精为后人推许,但态度严厉的非议之声亦不绝于耳。早在荀子,便有“孙吴上势利而贵变诈”(《议兵》)的指斥,直至明朝,宋濂尚言:“古之谈兵者,有仁义,有节制,至武一趋于权术变诈,流毒至于今未已也。然则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祸首欤。”^⑧满清亲王允礼更是一针见血:“春秋以来谈兵者凡数百家,而《孙武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为最,然其言愈精而其心愈忍矣。”^⑨中华文化重德尚义,企慕和平,虽也承认战争之意义,却贴上“不得已而为之”的标签。在如此文化生态下,以“诡道”言兵的孙吴当然不及以“非攻”论战的墨子更能得到社会认可,墨家的“守”成为中国论“戎”的基本态度,这样的军事思想,虽不及权谋、攻伐具有战争实效,却与民族心理更为相契,成为显学,自在情理之中。

“以戎为业”的墨家所以能够成为显学,在“守”而不在“攻”,在“技巧”而不在“权谋”。早期社会中,兵役制度大半为举族皆兵,凡有作战能力之男丁,均须当兵服役,士人尤然。顾颉刚先生即言:“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⑩墨家自不例外,但其所服兵役的主要内容却并非执戈上阵,而是设防备守,具体的工作则集中于器械制造、机关设计等军事防御工程。墨子,作为墨家之代言者,当然是此中翘楚,以今日眼光视之,或可称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工程师。无独有偶,西方语言中 Engine(工程师)一词,直

① [美]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王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6-87页。

② 冯友兰:《原儒墨》,《三松堂全集》第1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6页。

③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7-1738页。

④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62页。

⑤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57页。

⑥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133页。

⑦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133页。

⑧ 宋濂:《潜溪后集·诸子辩》,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65页。

⑨ 允礼:《孙吴论》,《清文颖》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5页。

到18世纪才摆脱了最初的军事含义^①。而墨家的“以戎为业”正是以“工”为其显著标识的,无论其组织形态,还是其理论逻辑,均在这方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烙印。

五、工师与绳墨

“钜子”是墨家组织形态的重要构成角色,然“钜子”之说不见于《墨子》,最早的“钜子”信息来自于《庄子·天下》篇;墨家后学“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②。陆德明《经典释文》称:“(巨子)向崔本作钜。向云:墨家号其道理成者为钜子,若儒家之硕儒。”^③向秀注曰:“巨子最能辨其所是以成其行。”^④后世对于“钜子”的理解多本于此,将“钜子”视为墨家组织的领袖、导师。巨子在墨家中的地位、影响无需多议,然此等卓越领袖何以用“钜子”命名?为何独有墨家以巨子为圣人?其中颇含深意。“子”为古之尊称、美称,暂可不论。以“巨”而论,“巨,大也”。“巨子”类于“硕儒”,其义亦通。然而,巨之言“大”乃宋、齐之间方言^⑤,论其本义则为规矩。《说文·工部》:“巨,规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桀,巨或从木、矢。”巨之金文作“𠄎”,正象一人手持“规矩”之形。所谓规矩,便是所持之器物,正是“工”。杨树达先生认为,工为器物,故人能以手持之,又云:“以字形考之,工象曲尺之形,盖即曲尺也……盖工与巨义本相同,以造文之次第论,初有工文,双声转注,后复有巨。制字者以巨工同物,故即就工字之形为巨字,后人习用巨字,致曲尺之义为巨所独据。工字之初义不明。”^⑥由此而论,“巨子”便有了另一重意思,即持巨(工)之人,掌握规矩的人,由此意引申为领袖似乎更为妥帖。墨家巨子持律甚严,不容违逆,后学奉为圣人,则视其为规矩。墨家以军事制作、军事工程为职,规矩尺度最为所重,以“巨”为代言,最是切合情理,正是墨家区别于诸子之所在。诸子百家各贤其贤,然以“巨子”命名者,唯有墨家,对工具如此尊崇,正是墨家之本色体现,更包含着原始墨家的文化信息。

“工”之由来久矣,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部分,可以追溯至最早的石器制作。早期的石器常常集多种用途于一身,可用于劳动生产,亦可用来攻击自卫,自然有着武器的色彩。甲骨文中的“工”字更属常见,歧义亦多,或云像斧形,或曰像连玉形,可用作攻击之“攻”、戎功之“功”、贡纳之“贡”、贡典之“贡”、官吏之“官”等。前两种用法均与军事有所关联,后两种则涉及祭祀礼仪,恰说明了“工”与“国之大事”密切相关。于省吾先生指出:“工亦读如字,指官吏言之。《书·尧典》之‘允厘百工’,伪孔传谓‘工,官也’,《诗·臣工》之‘嗇嗇臣工’,毛传谓‘工,官也’。工训官古籍习见。”^⑦在《诗》、《书》时代,“工”很是具有“官”之品格,按《国语》所载,《齐语》云:“处工,就官府”、令工“群萃而州处”。《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可见,“工”之衣食所养由国家提供,系某种意义上的“食俸者”。《左传·昭公七年》有一段关于臣属等级的论述,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尽管“士庶工商”的排列屡见于《左传》、《国语》之中,但在区别上下的序列中,却没有工的位置,正折射出“工”之地位与众不同。《礼记·王制》所述甚为明确:“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将以“技”为职的“百工”纳入巫、史之列。《周礼·考工记》云:“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也。”郑玄注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属……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无论是城郭之营建,抑或是器械的制造,均与军事关联甚深,而《考工记》所列工种中,专门的兵器制造约占五分之一,涉及军用者,或达半数以上。可见,“工”之为用,虽不限于军事,却以此为重。需要特别指出的则是

① [英]李约瑟原著,[英]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00页。

② 郭庆藩撰,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第1079页。

③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十八,《四部丛刊》本。

④ 郭庆藩撰,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第1080页。

⑤ 钱绎撰集,李发舜、黄建中点校:《方言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3页。

⑥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8页。

⑦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3页。

其“国有”特征,作为关系国家大计的军事工程、武器制造,无论场所、工具、材料等,多半为官属,参与设计、制作的“百工”、“工匠”之流,同样由国家奉养^①。墨家“以戎为业”,溯其职业之本,即是这样的“工”,有独立的职业技能,有特殊的知识背景,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更因军事的特殊性而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此,正构成了墨学所以能够成为显学的社会基础。

《周礼·考工记》云:“审曲面势,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②对于这样的“百工”要求,墨家无不兼备,更有理论的总结与提升。《墨子·法仪》载:“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③与《考工记·舆人》“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县,衡者中水”同出一辙,所不同处,则在于《墨子》能够从方、圆、平、直的具体实践中,提炼出“法”的标准思想。“作为工艺技术汇总的《考工记》,主要反映了工匠的传统,而《墨经》则有更多的学者传统,它反映的一些科学理论认识是直接以手工业技术实践为基础的。墨子结合了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总结了工艺技术的经验知识,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形态。”^④除去论说的理论总结外,更有深层的意义思考。《墨子·鲁问》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鸢,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鸢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⑤公输子是《墨子》中的能工巧匠,亦系墨子很重视的对手,更是大名鼎鼎的鲁班,被后世土木工尊为祖师。这段故事在《韩非子》中也有记载,不过,主人公换作了墨子,主题则变为了墨子的自省。《淮南子》则曰:“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⑥显然,对于在攻守对决中屡屡折服公输般的墨子而言,“以木为鸢(鸢)”这样的技术之事完全可以胜任,关键之处则在藏于其后的价值判断。何为真正的“工”?技巧层面的精致完备并不是最好的诠释,胜义的妙处终究落足于道义之上。“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⑦以墨家职守而论,本在兵戎,然墨子却不肯以此自诩,其最为后世所津津乐道者亦是与战事背道而驰的“兼爱”、“非攻”。由“技”而“道”的升华正是墨学显扬于世的根本所在,墨子便是完成这一转换升华的集大成者。

关于墨子的出身,《史记》定位为“宋大夫”,郑樵将墨氏归于“孤竹君之后”,其后顾颉刚、童书业诸先生均从姓氏源流肯定墨子的贵族血统,傅斯年先生更指出:“墨子出身盖亦宋之公族(顾颉刚语云,墨氏即墨夷氏,公子目夷之后。其说盖可信),后世迁居于鲁,与孔子全同。”^⑧然而,“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的墨子却以“贱人”自称(参《墨子·贵义》),所带弟子“面目黎黑,役身给使”,孟子言其“摩顶放踵”,荀子斥为“役夫”,显得并无丝毫的大夫风范。钱穆先生则从字义引申,认为“墨”为奴役之称,现代研究者则多半按照职业习惯将迥异于“农”的墨子看作为手工业匠人。以历史眼光来看,贵族在远源上与工匠角色并无实质性尊卑之别。《诗》云“君子于役”,古代差役系古代贵族对于国家的应尽义务,有身份有地位的君子自无例外。《说文》云:“役,戍边也。”兵役是古代政役最为基本的构成,对于“以戎为业”的墨家而言,服役戍守并非有失身份之事,倒是职中应有之义。以其可能从事的事务而论,制造兵器、修筑城池,自与讲学论道不同,长期的野外劳作,不免使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以行事、容貌而论,不免有些近乎苦工。这与贵族的血统、“百工”的官位并不协调。如果说墨家必须依靠苦力谋生的话,那么这个“苦”是生存的必需,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自讨苦吃。然而,墨家

① 具体分工中,最为粗浅的笨重工作、无关大局的细末工作,必然会使用奴仆任之,即所谓的“工奴”。由于其所从事的工作缺乏技术含量,可以随意替代,更不会有“工之子恒为工”的世袭传承,自然地位低下,通常被视作“奴”,或不得入“百工”之列。

② 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110—3111页。

③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20—21页。

④ 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6页。

⑤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481—482页。

⑥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第369页。

⑦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第385页。

⑧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2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5页。

却被冠以了“自苦”^①的标签,这恰好说明墨者并非藉此谋生的“劳力者”,乃是能够身体力行的“劳心者”——墨子不仅十分认同王公、士君子、农夫、妇人的分工,更极力主张“各从事其所能”^②。《周礼·考工记》曰:“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③特别标明的“圣人”属性无疑有着正名定分的探源意义,能述之守之的“工”与儒家述而不作的传统颇为吻合,而紧承“智者”的“巧者”定位最可说明“工”之地位的不凡,亦折射出儒、墨之间的近缘关系。所谓智者,约与古巫相近,是知识、技能的最初拥有者,能够“述之”的“巧者”则是社会分工细化后的新知识阶层,祝史医卜等皆在其列,工亦不例外。墨家即是这样述之守之的巧者,不仅有高贵的学统、专门的技能,更有着不低的地位,但职业所限、志向所至,越是出色的墨者,越需身体力行,越是近乎役徒,每每表现出有悖常情的“自苦”,此非故意标榜,正是本色所在。

至于墨子的姓氏,世人多作“姓墨名翟”,至《北山移文》有“翟子之悲”之语,后世诗文偶有袭用,多为对仗之需^④。元人伊士珍《琅嬛记》引《贾子说林》^⑤云:“墨子姓翟名乌,其母梦日中赤鸟飞入室中,光辉照耀,目不能正,惊觉生乌,遂名之。”^⑥《琅嬛记》撮抄杂说,被四库馆臣定为“荒诞猥琐”之作,“所引书名大抵真伪相杂”^⑦,似不足为据。然清人却颇有信从此说者。周亮工即言:“墨子姓翟,母梦乌而生,因名之曰乌,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以墨为姓。是老子当姓老耳?”^⑧四库馆臣同样以“其说不著所出,未足为据也”不予认可。其后,程大中亦曰:“墨子姓翟,母梦乌而生,因名乌,以墨为道,墨非姓。”^⑨虽同样不言所出,然程大中“殫心稽古,淹通经史”^⑩,更当乾嘉考据之风潮,征信程度或胜于前。至晚清江瑛,更是发扬此说,罗列八证,比类分析,论述墨子之墨,非为姓,而系道术之称。后人或信从,或辩驳,墨子之姓氏遂存歧义,分歧暂可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出处不明的一则材料,自元及清,论者由摘录而至论析,史料固然有限,其中的文化信息却有了更为清晰的解读。是否为姓氏暂可不论,但“墨”之命名实与墨道相关,这里的“墨”应是被反复提及的“绳墨”,亦即工匠用来画直线用的工具。《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⑪《礼记·经解》云:“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⑫绳墨不仅是工具,更引申为规矩、准则、法度。这正是墨家所极力主张、反复要求的,更与尊巨子为领袖的墨家传统相一致。清儒唐甄曰:“大匠不能徒直,定于墨绳;不能徒方,准于曲尺。”^⑬墨绳、曲尺的规矩方圆系工匠的第一要义,以之作为标识,自在情理之中。“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⑭墨子此言正是这一精神的集中反映,亦是墨家“工”本色的流露。再来看“翟”,最早的记载当为《尚书·禹贡》中的“羽畎夏翟”。孔传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⑮“旌旄”一词,

① 《庄子·天下》篇一再称墨家“以自苦为极”,“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

② 参见《墨子》中《非乐》、《耕柱》、《节用》诸篇。

③ 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3114页。林尹先生《周礼今注今译》断为:“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可备一说。

④ 如唐人谢观《误笔成蝇赋》(《文苑英华》卷一一四)、元人徐天倪《拟古》(《石仓历代诗选》卷二七九)、宋人姚勉则有“无翟子兼爱之偏”之语(《雪坡集》卷四十二)。

⑤ 同书亦有作《贾氏说林》处。

⑥ 伊世珍:《琅嬛记》卷下,明万历年间刻本,第5-6页。

⑦ 永瑆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17页。

⑧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十,清康熙六年(1667)刻本,第48页。

⑨ 程大中:《四书逸笺》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05页。

⑪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944页。

⑫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1256页。

⑬ 唐甄:《潜书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98页。

⑭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20页。

⑮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廖名春、陈明整理,吕绍纲审定:《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

可以留意。《周礼·司常》云：“全羽为旛，析羽为旌”，又言“凡军事，建旌旗”^①，以翟羽装饰的旗帜是用来指挥军队的。《诗·邶风·简兮》云：“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舞者不仅“有力如虎”，所表演的万舞，更是与军事行为关系密切。可见，“翟”之为用，多与军事相关，此点正可与墨子之言行互为印证。

论及墨子的官守，“宋大夫”的回答略显疏简。墨子为“工”，墨家弟子为百工之属，以墨子的领袖地位而言，当为百工之长，即古之“工师”。古代“工官”，初见于甲骨文之“工”，“巫”字从工，其义相通，工、巫之属即是当时有力之职守。商周金文中，“司工”之名屡见于器。郭沫若先生言：“凡司空之职，彝铭均作司工，无作司空者。”^②周代六卿，司空为冬官，掌管工程。营城郭，建都邑，制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与墨子之言行职守颇为相合。先秦典籍中又有工师之职，《礼记·月令》先曰：“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③又曰：“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更反复强调，“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④与墨家之节用务实精神甚为吻合。“工师”虽于《周礼》中未见，然《左传》中的“工师驷赤”当深为留意。这位“工师驷赤”虽仅于史籍中一现，却是郟邑战役的主角，不仅是战争胜负的决定者，还懂得赋《诗》对答。而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子不仅屡屡称引《诗经》，亦是多次攻守战役的灵魂人物。冷兵器时代，军事工程技术于战争胜负关系重大，从事如此要职者自是战事之关键人物。驷赤、墨子无疑系其佼佼者，不仅攻守之“技”娴熟，而且有着“道”的关怀。《论语·为政》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由“器”而“道”的驷赤、墨子之流自不同于一般层面上的“某工”，而是有着传道品格的“师者”。《荀子·王制》称：“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权衡辨识之职能的特别提出，正折射出“工师”所专有的衡量能力与评定权力。《史记·五帝本纪》载：“灌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⑤可见，工师论定品鉴之事，古已有之。张守节《史记正义》称：“工师，若今大匠卿也。”^⑥大匠卿，为梁隋官职名，掌土木之工，改之汉时“大匠”，秦有“少府”，春秋时则为工正、工尹、工师，掌管百工。能够品评他人，且为世所认可者，定为杰出之辈，即今之大师巨匠。孟子最是一针见血，一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⑦，再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⑧。以规矩绳墨为大匠标识，拟之墨子之言行信念，最为贴切。

“工师，工官之长也。”^⑨虽系国家所设官职，却不仅是官方的地位认可，更包含着特殊的社会认同。以“工”而论，规矩绳墨最为重要，以“师”而论，技艺传授外，须有“道”之升华，二者兼之，方可为一流大匠，墨子适足当之。以官职论，墨子是宋之大夫；以技而论，墨子能以木为飞鸢；以职守而论，则有善守之誉；以道而论，则有兼爱尚同之说，授徒讲学，与儒并显。墨翟技巧过人，德行服众，有着特殊的个人魅力，是当时最杰出的工师。墨家弟子多为百工之属，服役从学，甘为赴火蹈刃，在内部以“钜(巨)子”作为首领之尊称，作为标识的则是不可或缺的规矩法度。墨家之“工师”，有如儒家之“师儒”，由来已久，流衍广远，直至今日，土家族对技艺娴熟的工匠首领仍尊为“掌墨师”，有着特殊的职权，地位崇高。礼失而求诸野，其间或有古之“工师”的印迹留存。

① 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2200页。

② 郭沫若：《金文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65页。

③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435页。

④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489页。

⑤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28页。

⑥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29页。

⑦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803页。

⑧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944页。

⑨ 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40页。

六、余论

墨之源流,近本于工,远溯于巫。“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①儒以祀为职,墨以戎为业,论其渊源,皆本之古巫之道术,述往圣、救时弊,仁民爱物,故多有相通之处。“墨子之学以‘兼爱’、‘尚同’为本。‘兼爱’、‘尚同’则不得不‘尚贤’。至于节用,其旨专在俭约,则所以达兼爱之路也。节葬、非乐,皆由节用来。要之,皆尚俭之法耳。”^②墨家对于儒家的非议,集中于违背节俭之旨的丧葬之厚、礼乐之繁,并及知命、远鬼神的态度,指斥最激烈的对象则是“小人儒”,却又与儒家的君子追求不谋而合了。

儒、墨同源而近,并为显学。道、法异派,不辨细微,概而斥之。惟荀子为后起大儒,深为辨析,指斥最严,论述最详,剖析最切。其言“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③,诚为中的之论。墨家以戎为业,职守在工,在他们身上有着浓重的技术思维与军事色彩,体现在思想中,便是对于具体差异的忽视,习惯以同一的模式、同一的标准对待不同的对象,如“兼爱”之说,推其本心,自在生民之关切,然忽视百姓伦常之别,不免受到“无君无父”之讥,在小群体或可奏效,却难以全面推行。墨家最讲究“法仪”,重视方法,其“三表法”的提出导自于“言必有仪”的判断,有着明显的工具理性与实用考虑。又如“尚同”之说,是其为政之本,强调下级的思想言论、认识行为、赏罚舆论均要绝对服从上级、服从规律,亦是典型的技术思维与军事色彩的体现,对于确实存在的具体差异缺乏尊重,“他的全般思想,都站在尚同说的观点上面,站在齐一主义的立场上面”^④。儒家之胜,即在“和而不同”的提出,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⑤,儒、墨显扬一时,儒家历数世而独尊,墨家则没落无闻,其在此乎?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⑥是荀子对于墨学的又一剖切之论。墨家以实用为鹄的,“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⑦。墨家以戎为业,却在兼爱思路下专意非攻,深层的学理矛盾显然不能以实用与否的简单评判来作答,然而,实用理性下的功用追求,使得墨家在探求更为宏深的学理时大受影响。“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也。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⑧墨家之衰,正在于功用追求下的道器分离,以道而论,墨家与儒家极为相近,却不及儒家的精细有别;以器而论,“墨家对自然界的兴趣与他们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实用目的结合得太紧密了”^⑨。涉及军事之技艺,多秘而不宣,弟子屡屡诚心苦求,墨子方为传授,但一脉相传,流而不广,自墨子这样的集大成式人物之后,墨离为三,却未像儒家那样出现孟、荀那样的大成人,后学离散,各守一隅,或并入儒家,或流为工匠。道离于器,师为之失,行之难远,不免衰歇,即在今日,亦当深思。

[责任编辑 曹峰 邹晓东]

①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第66页。

② 章太炎:《诸子略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15页。

③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319页。

④ 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⑤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470页。

⑥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392页。

⑦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116页。

⑧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399页。

⑨ [英]李约瑟原著,[英]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第218页。